

96
F729.44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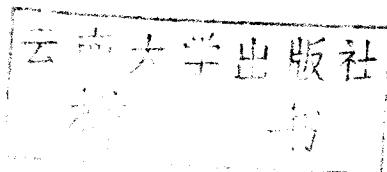
XA354/20

宋代东南市场研究

龙登高 著



3 0078 8533 2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11月



C

190144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章 农村市场	
——以小农家庭经济体为出发点的考察	13

引 言 东南地区的小农家庭	13
第一节 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特征	
——侧重于家庭与市场的经济联系	18
第二节 东南农村市场：小农家庭的消费需求	23
第三节 农村市场的商品供给	
——从小农家庭产业结构的变化入手考察	30
一、家庭产业结构变化的社会经济动因	30
二、家庭产业结构及其变化	36
三、东南农村市场：小农家庭的商品供给与 市场活动	39
第四节 促进与制约：小农家庭与农村市场的 辩证关系	46
附 论 封建大家庭及其庄园与农村市场	50

第二章 城乡市场等级网络

第一节 新兴经济中心地	53
一、集市与中心地的成长	55
二、各类市镇的普遍兴起	59
第二节 县镇中心地	67
第三节 州府城市市场的发展	77
一、个案分析：饶州城市场	78
二、城市人口分析	81
三、州府城市商税分析	84
第三节 地方性市场等级网络	88

第三章 东南地区的商品流通

——以远距离贸易为重点	98
-------------	----

第一节 商品流通条件的改善：物流与信息流	98
第二节 足迹寻踪：东南长途贩运商	106
第三节 大宗商品的流通（上）：商品粮的远距离 运销	110
一、东南向汴京、淮南市场的商品粮输出	110
二、福建、浙东的商品粮输入	111
三、临安府、建康府等地的商品粮输入	113

第四节 大宗商品的流通（下）：其他商品的主要	
产地及其向外辐射	118
一、纺织品的输出中心	118
二、果品的产地及其销售	121
三、生产资料的远距离贸易	122
四、专卖品的长途贩运	123
五、文化用品的输出	125
第五节 趋势与障碍：远距离贸易与商品生产	129
第六节 海外贸易与东南市场	135

第四章 货币流通与市场价格

第一节 两宋东南的货币流通	143
一、十一世纪东南的通货紧缩	143
二、两宋之交币制的混乱	145
三、南宋东南会子的行用及其对货币流通的影响	147
四、金银在两宋东南的行用	154
第二节 市场价格分析	
——以粮价为例	159
一、粮食供求格局与粮价的季节性波动	159
二、地域差价及其变化	163

三、两宋东南粮价波动大势	164
--------------	-----

第五章 市场营销与商人资本

第一节 市场营销的进步	173
一、经纪人交易	173
二、批发商业	179
第二节 商人资本的运动	189
一、启动资金的来源	289
二、不同种类商品流通中资本及其利润生成的 差异	191
三、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的艰难渗透	197

第六章 封建市场比较研究

第一节 纵向比较：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与明清江南 市场	203
一、宋代两浙区域市场格局	203
二、明清江南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with 变化	210
第二节 横向比较：宋代东南与西欧中古盛期的市场	218
一、东南的小农家庭与西欧的庄园	219

二、东南的集市与西欧的市集	222
三、中心地与市场网络的差异	225
结 论	233
英文提要 (Synopsis)	239
后 记	245

绪 论

一

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纽带。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市场机制居于统治地位，无论经济的宏观运行还是微观活动，乃至人民的日常生活，无不与之息息相关。它，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与流通的载体，作为商品买卖行为与交换关系的总汇，我们在原始公社以后的前资本主义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可以发现其踪影。在封建社会经济中，它始终在伊壁鸠鲁的缝隙中艰难地成长，像涓涓细流般不断冲蚀着自然经济的领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其他历史条件的具备，它终于率先在西欧经济体系中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封建中国虽与西欧大异其趣，这一历史进程缓慢得多，但市场势力毕竟在不断扩大，并深刻影响着封建经济的运动。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但不是市场经济的范畴，吴敬琏先生指出：“商品经济是根据产品是否通过交换进入消费这种外部表征来界定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则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这种内在特征来界定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社会化程度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¹⁾显然，封建社会不存在市场经济，而且，市场也只是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中，即，人们进入市场是为了购买商品以满足不同程度的需要。尽管如此，研究市场经济，仍然有必要了解其来龙去脉，以期从历史的角度探寻其演进轨迹。

对中国封建市场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市场演

进的历史脉络，而且有助于我们以之与西欧相对照，追寻中西社会经济史的异同，探究市场发展的共性的、个性的经济规律。然而，这一重要课题的学术研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大陆迟至八十年代才逐渐受到重视，已落后于海外中国经济史学界。在此以前，只有很少的有识之士在这块学术园地上默默地拓荒耕耘。

业师李埏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一文中，通过对卖炭翁等的市场活动与生计状况的个案分析和计量分析，精辟地论述了唐代城市小生产者的市场活动及其影响。八十年代初，当科学的春天来临时，他又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一文中，将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进行了通贯古今的总结。⁽²⁾在他的熏陶和鼓励下，我选择了宋代的东南市场为题进行研究。

二

处于中国封建经济转型阶段的两宋时期，市场正经历着一场自晚唐开始的革命性变化。唐代以前，“既没有进入地方贸易体系中的周期性集市，也没有发达的远距离贸易进入农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城市市场则受到坊市制的严重束缚，⁽³⁾封建市场相当落后。然而，“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进入日常贸易的农业剩余品远过于前代，私商经营的谷物布帛的大规模贩运成为商业的一个重要特征。”⁽⁴⁾城乡市场大为发展，以伊懋可的话言之，此时中国发生了“市场结构的革命”。⁽⁵⁾而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则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

“东南”在宋人的观念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大至可以包括整个南方。北宋流行的“东南六路”是指两浙、江东、江西、淮

南、荆湖南、北路,其漕粮上京事务由发运司统一管辖。南宋虽囿于半壁江山,但在正统观念的支配下仍沿用“东南”的说法,与“四川”、“中国”等并称。然而,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南者,应该是我们划定的四路,这一范围,也就是今华东经济协作区的长江以南部分,在汉代属于同一个一级行政区(扬州),此后至唐则常常分属为二。

北宋立国之初,东南四路仍分别处于南唐、吴越等割据之中。直至976年,宋廷于上年底攻克金陵之后,开始了对江南的有效统治;是年又接受吴越王钱俶上朝称臣,同时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也成为宋朝的一个节度使,两浙、福建实际上纳入宋朝版图,两年后完成献地仪式。宋王朝对东南的统治,整整三百年之后(即1276年)随着蒙古军铁蹄踏入临安而告结束。

在这三百年间,东南地区的经济在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水平最高,在各项经济指标上,不唯远过于南方其他地区,在北宋也已超过了北方诸路(详见附录:表0-1及说明)。它仅占全国面积的18.67%,而到北宋熙丰鼎盛期,却拥有29.37%的耕地、31.6%的人口、33.57%的二税收入,上供中央的钱物更高达68.84%。东南经济发展至南宋持续不衰,福建、江西及两浙尤为迅速,已被时人视为发达地区,这里“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虞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荆襄等地则是发展中地区,有待开发“以发泄其气而用。”⁽⁶⁾东南四路在南宋的地位举足轻重,吴潜评论说:“当今东南号为腹心,根本所当固结者,不过两浙、福建、江湖,而两浙为畿内,福建、江东为近畿。”⁽⁷⁾

东南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培育了宋代典型的封建市场,而且,经明清时期的继续发展,东南市场发育更为充分,并成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早期源地。如此看来，对宋代东南地区的市场的考察，是中国封建市场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三

明清江南市场研究，自傅衣凌先生开创江南经济史之后，近来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⁸⁾而国际国内中国经济史学界对宋代东南市场的研究成果，却与其重要性很不相称。许多关于宋代市场的开创性学术成果，或多或少涉及东南，但并非专题考察，例如，加藤繁的草市与纸币研究，全汉升先生的商品与物价研究，李埏先生的货币经济研究，漆侠先生的商品生产与商业资本研究，梁庚尧博士的农产品市场研究，傅宗文先生的草市镇研究，等等。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在工商业、海外贸易、农村商品经济等方面，对浙江、福建、江西的地方经济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对宋代长江下游（包括钱塘江流域）市场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则斯波义信可谓执其牛耳，他的个案分析尤为精当入微。他曾分别论述了杭州的三级市场圈，宁波及其腹地的贸易盛况，湖州、徽州、宁绍亚区等地经济与市场的特征，并对长江下游的城市化与市场发育作了概述。⁽⁹⁾

已往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的深入考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们的研究应该在现象性描述之上，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探究；在专题的、片断式的研究之上，对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综合作用进行考察；在东南各地市场的单独分析之上，对它们之间市场特征、演进轨迹及经济联系进行勾画。许多问题有待探索、有待深化：作为古代市场发展的基础，农村市场在宋代东南的状貌如何，它与市场运行主体有何内在联系？中心地如何成长，它与市场是否形成自身的网络与体系，如果已经形成，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在东南市场，商品如何运

动，货币流通状况如何？与此紧密相关，市场营销渠道有何发展，商人资本怎样运动，市场价格特征与物价波动的状态如何？……

本文力求对东南市场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但并不苛求形式上的面面俱到。对于学术界已有详论者，只是简略提及；对于未尝涉及者，则详加探讨；对于论之有误者则深入考辩。在具体的论述中，既从宏观上进行综合分析，又辅之以微观考索与个案分析；既对东南各地市场进行共性的了解又对各地的差异进行个性的剖析；既作抽象的、定性的论证，又作具体的计量分析；既探寻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又考察它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障碍。本文将依照如下思路铺笔行文：由农村市场而城镇市场，建构各地的市场网络体系；由商品流通而货币流通，考察各网络内部的商品运动，及东南各地之间、东南与外地之间乃至与国外市场之间的远距离贸易和海外贸易，描述市场价格特征及其波动大势，并探讨它们对市场的影响；随后分析市场营销技术与商人资本发展的新动向；最后，通过宋代东南与明清、与西欧中古盛期的市场纵横比较，对宋代东南市场的发展程度、特点和趋势进行评估阐述。

宋代东南市场是一个棘手的重要课题。有关封建市场理论的缺乏使进一步的考察存在相当难度，现代市场学虽可供借鉴，但发达的市场经济毕竟与封建市场不可相提并论，运用其理论若不审慎，以今况古，就难免牵强附会。同时，史料的不足往往影响论述的精密化与科学化，尤其是原始统计材料多局限于自然经济下的政府财政领域，且时有讹误，计量分析不得不迂回曲折地进行，这就难以克服模糊性与粗略化……凡此种种，都有待深入的艰苦的开拓，远非旦夕之功。本文也因此只能是一个尝试性的开端，但求能够成为大辘的椎轮而已。

〔注释〕

- (1) 《尽快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香港)《经济导报》1992年第41期
- (2) 二文均收入《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3) Yoshinobu Shiba(斯波义信):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s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载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J.W. Haeger eds. P41.
- (4) Denis Twitchett: "The Tang market System", Asia Major, 12(1966).
- (5)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P165-172.
- (6) 《龙川文集》卷首，又见《宋史》本传。
- (7) 《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 (8) 对此，我在《近年来封建市场研究概述》一文中作了介绍，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9期。
- (9) 其文分别载于：《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梅原郁编，同朋舍，昭和59年版；《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s. by Skinner, Stanford, 1977；《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88；《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附录：表 0-1 及说明

表 0-1：北宋东南各项经济指标
及其在全国的比重

经济指标		北宋 全境	东南 四路	北方 诸路	淮南、 荆湖	资料 来源
面积	平方 公里	2504988	467772	616911	431980	《历史 研究》 1957.3
	百分比	100%	18.67%	24.63%	17.24%	
垦 田 数	元丰 亩数	461655557	135604212	97917609	156549695	《通考· 田赋 四》
	百分比	100%	29.37%	21.21%	33.91%	
在 籍 户 数	太宗 时期	6108635	1637442	2061482	行政区划变 动较大,缺	《太平寰 宇记》
	百分比	100%	26.80%	33.75%		
	元丰 年间	16569874	5237239	4320762	2885831	《元丰九 城志》
	百分比	100%	31.60%	26.03%	17.42%	
	增长率	171.25%	219.84%	109.59%		
人口 密度	每平方 公里户数	6.61	11.20	7.00	6.68	元丰 年间

经济指标		北宋全境	东南四路	北方诸路	淮南、荆湖	资料来源
商税(贯)	嘉祐年额	四川诸路以铁钱计难以统计	1004706	1929695	1063190	《宋会要·食货》15-17
	熙宁年额		1738971	2334892	1147887	
	增长率		73.08%	21.0%	7.38%	
元丰二税额	贯石束等	52010939	11993566	22644045		《通考·田赋四》
	折算额	35725230	11993566	11681877		
	百分比	100%	33.57%	32.7%		
北宋后期租税之匹布	罗綾绢等	3414168	1329575	1277048	282171	《宋会要·食货》64
	百分比	100%	38.94%	37.40%	8.26%	
	布(匹)	487847	12704	261914	102173	
	百分比	100%	2.6%	53.68%	20.94%	
	丝绵(两)	9115421	3547828	2783218	1313531	《通考·国用一》
	百分比	100%	38.92%	30.53%	14.4%	
	总计	13017436	4890107	4322180	1697875	
	百分比	100%	37.57%	33.20%	13.04%	
宣和上供钱物	贯石匹两	15042414	10354774	2043939	1962149	《梦溪笔谈》卷12
	百分比	100%	68.84%	13.59%	13.04%	

几点说明

(1) 关于商税。统计过程繁复，本表与加藤繁、程民生的结果⁽¹⁾略有出入，但差额不大。

华北商税之巨与北宋政府的特殊政策有关。将全国各地财赋集中于中央，这是宋廷的一贯政策，其中包括吸引商人长途贩运至京。另一方面，汴京是都城，河北、河东是战略要地，宋廷不断从国库中拨出巨额钱财，优惠商贾，刺激了大规模的人中等商业活动。这样，北方诸路商税额自然膨胀。东南的商业活动则几乎完全由自身经济与市场的发展促发而成，并且其增长速度远过于北方。

此外，东南商税额没有包括海外贸易收入。各市舶司的净利息钱，治平年间超过 600000 缗，北宋末年逾 1000000 缗，南宋初年高达 2000000 缗。如果加上两浙、福建的市舶息钱，则东南商业税总额当超过北方。

(2) 关于二税额。本栏及后两栏参考了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二税物品繁杂，计量单位不一，严格说来可比性不大。本栏“折算额”只是将草类折算为缗钱。因为草类数额巨大，而价格极贱，大中祥符年间，定州每围 5 文，河中府每围 4 文，⁽²⁾元五年开封府以高价收购，每束 28 文。⁽³⁾若以此高价估算，熙宁十年秋税草额 16754844 束，⁽⁴⁾则值缗钱 469135，北方诸路数字则以全国三分之二计，因为税草主要在华北与陕西。此外，北方二税中粮食与布帛的比重不大，例如，元丰年间河东十三州，二税以石计 392000 有余，布帛以匹两计

226919，二者合计仅占二税总额 2372187⁽⁵⁾的 26.1%。南方夏税则税钱。可见在二税数额中，尽管原始数字北方很大，但实际价值东南四路要高，并且无疑还要高于本栏“折算额”。

(3) 关于上供钱物。北方诸路尤其是河北、河东，军费开支浩繁，地方财政收入多就地留用，上供较少。近年有些学者据此夸大北方的负担与经济势力，则又嫌矫枉过正。邢铁先生统计了北宋年税绢量和年贡绢量，两浙一路都超过河北、京东四路的总和，指出这是因为河北、京东的数额仅仅是其所应交数额的一部分。⁽⁶⁾事实上，河北固然如此，京东未必尽然；年贡绢量固然如此，年税绢量则不然。程民生博士说，便余军粮、马料，河北曾一次达 600 万石，河东曾一次达 500 万石，都超过东南任何一路的年漕粮数。⁽⁷⁾这里，且不论东南在租税之外也常行和余，而北方便余、和余尚包括马料，我们试问，河北、河东的官余粮草都是仅依靠本路完成吗？否！沿边官余粮草往往是通过各地商人入中而实现的。包拯的几道奏文对此说得十分明白。⁽⁸⁾事实上，以河北、河东的户口及户均年食粮量、垦田及亩产量，粗一估算，就可发现两路不可能有 5-6 百万石的余粮以供官余。只有在极好的年景才能达到一百万石左右。据包拯奏文载，庆历三年，河北“二麦大熟，近朝廷支拨见钱，及本路应系诸般封椿钱等，并令收余，共及一百万石。”这里必须严格区分“便余”、“配余”等方式与本路“收余”的差别。

(4) 最后我们谈谈进行南北比较应该注意的问题。

沿边三路的军费负担固然十分沉重，但不能以此夸大北方的经济势力，不能以此否认东南各项经济指标超过北方的客观事实。《宋史·食货志》说：“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余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榷货务缗线，皆不翅数百万。”三路强烈仰赖于

中央和东南财赋。包拯指出：“自西事以来，三路并仰三司，逐岁入中粮草，支榷货务见钱银绢香茶，纳数千万贯。”如果“渐减入中见钱，以宽县官经费，不逾三五年，东南财用尽聚京师。”⁽⁹⁾这充分说明，东南财赋不仅供养着京师，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沿边诸路，故史云：“汴渠水运甚广，河北、陕西资焉。”⁽¹⁰⁾此外，进行南北比较必须注意可比性前提。南方的淮南、荆湖、广南等路，经济水平仍落后于北方，与东南四路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将整个南方作为一个单元与北方进行对比是不妥当的。有人比较南北亩产量云，南方二石，北方一石半，诸如此类，⁽¹¹⁾显然与史实不符，也使得其比较失之牵强。更何况，整个南方的面积远大于北方呢？事实上，近人所谓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只是移向东南。无论从地域面积上，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上，只有选择东南四路与北方诸路（不含陕西，严格说来也不应包括京西南路）作为比较单元，才具备恰当的可比性前提，才能使比较研究取得客观而公允的历史价值。

〔注释〕

- (1) 加藤《宋代商税考》，载《支那经济史考证》下册，东洋文库刊1953年；程文《北宋商税统计及简析》，载《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 (2)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71，74。
- (3) 《长编》卷444。
- (4) 《文献通考·田赋四》。
- (5) 这三个数字分别出于《宋史·食货上三》，《宋会要·食货》64之，《通考·四赋四》。
- (6) 见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